

50th
Chinese Philosophy
1949—1999

中国哲学五十年

邢贲思 主编

辽海出版社

中国哲学五十年

The Philosophical Advancement of China: 1949—1999

邢贲思 主编

上海出版社

■ Liao Hai Publishing House

一九九九年十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五十年/邢贲思主编. - 沈阳:辽海出版社,
1999.10

ISBN 7-80649-097-3

I. 中… II. 邢… III. 哲学史-中国-现代 IV. 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4250 号

辽海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929 千字 印张:36.5 插页:2

印数:1—2000 册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陈 弢 刘一秀 责任校对:张 燕 高小荣

封面设计:刘海飒

版式设计:余 之

定价:70.00 元

序

王锐生

这里讲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迄今（1999）的整整半个世纪。它的过去，是背负着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因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它的未来，是即将到来的21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面前，中国人民既面临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又有可供民族腾飞的大好机遇。这就使得总结半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思维成为一件十分重要和极有意义的事情。

总结50年的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视角。本文的视角是：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从这一视角看，哲学在这50年的发展进程中，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哲学与政治。

哲学离不开政治。它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就不能脱离政治。这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性。马克思说过，对他来说，“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就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来说，阶级的命运决定了哲学的命运。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哲学就与共和国的兴衰共浮沉了。正是因为这样，“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流行起来了。综观这50年的哲学，在头七、八年，哲学为政治服务是有积极效应的。这表现在解放初期的一系列哲学学习和批判活动上。例如，学习社会发展史（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电

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冥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学习与批判就其具体做法与批判者的观点来说，无疑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它们都反映出当时党的领导层发动这些学习和批判的主观意图：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所谓“个人民主主义者”。学习与批判的政治目的，是促使这些社会精英实现思想转变，让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并通过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教育而在几亿人口中形成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向心力。哲学理论历来就具有促进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但它从来就没有像解放初期那样发挥过如此巨大的直接作用。50年代新中国社会风气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

但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毕竟是偏狭的。首先，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服务于政治，还要为社会提供发展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并为各门科学提供一般方法论。哲学研究中过分突出政治，就会影响哲学自身。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繁荣胜过以往的30年，其原因之一，就是哲学不再只突出政治了。其次，这个口号的社会效应好坏，还取决于政治路线（基本路线）是否正确。当政治路线不正确时，哲学家也无法抗拒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这时，哲学为政治服务所带来的就只能是负效应，有时甚至是一场灾难。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想抬头，这个口号给哲学带来的就是一连串悲剧。影响最大的要算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哲学把“新人口论”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批评，因为当时的政治是大跃进，而毛泽东认为，为了跃进，除了党的领导，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于是，控制人口之说就成了被哲学批评的对象。结果，不但伤害了马寅初，破坏了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而且使我国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长期中断，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不提了，但社会思潮又向另一个极端摆动：出现哲学告别政治的倾向。从表面上看，头30年哲学界一些不正常干扰很多都来自政治运动。但我以为，哲学还是没有理由告别政治。该告别的是逆时代潮流的政治。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每一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导言”）。因此，哲学不能超越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个时代的最根本的需要是该时代经济发展的总趋势，而经济的集中表现则是政治。这样，政治就必然要给予哲学以制约。哲学要使自己无愧于时代的要求，就不能拒绝政治的要求。问题只在于，哲学遵循的是真正体现时代潮流的政治，还是逆时代潮流的政治？在头30年，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遭到一些劫难。原因并不是因为人们遵循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政治，而是遵循了另一种政治。例如，1992年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遭到厄运，都被取消了。那是因为照搬苏联模式——而苏联模式中包含有一些逆时代潮流的东西。历史学在70年代被搞得名声扫地，因为“四人帮”搞“遵命史学”、“影射史学”。反过来看，社会科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都同时代的需要紧密相关。1978年后的若干年内，哲学一度红火，原因就是当时的哲学家敢于顺应时代潮流，敢于反对“两个凡是”，在哲学中讲政治（体现时代潮流的政治）。8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的“皇后”。法学与政治学“翻身了”，有人预言，法学将是“下一轮霸主”；而政治学是“曙光在前”。国际关系学将是“异军突起”。这一切恐怕也是由于这些学科同当今时代的最迫切需要——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外开放的需要直接相关。

总之，矫枉过正是不妥的。哲学应当学会善于总结经验。在总结哲学与政治这个题目时，关键在于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顺应

时代潮流，还是逆时代潮流。有人说，难就难在哲学家无法抗拒政治家的要求，让哲学去论证不是反映时代潮流的政治。其实，如果政治家是开明的，那么哲学家应当说服政治家，同他辩论。如果政治家不开明，那么就让开明的政治家先解决这个不开明的问题。如果哲学家没有勇气去坚持他认为合乎时代潮流的政治要求，那就“三缄其口”好了。但最好不要再为明知其不对的逆时代潮流的政治做论证了。

第二，哲学与价值。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苏联老大哥。苏联版本有很大成分是旧唯物论的影响。这种哲学讲世界观只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产生于物质，又还原于物质。但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既要改变世界，在世界观上就不能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而且还要对世界作出评价：这个世界好吗？值得我们接受吗？人希望它是怎样的？没有这种评价，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意志和热情。因此，世界观应当包括价值观。这种认识是近20年来的成果。

在80年代以前，哲学只强调物质本体论与阶级斗争论。从80年代开始，人们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和阶级的存在，但更强调实践、人和价值。实践唯物论成了“热点”，由此引出价值问题，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价值世界的存在。“价值热”于是流行起来。不过，“价值热”还有一个根源——现实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意识到价值世界的存在。在改革中，每一个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的争议。在对这些措施进行价值评价中，生产力标准还是意识形态标准又成为人们的不同选择。没有这个现实生活的背景，哲学的价值世界不会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

在前30年，哲学没有价值世界也可以。因为那时的哲学主要

是解释政治运动的。后 20 年的哲学绝对不可以没有价值世界。因为市场经济使利益多元了，人们的价值观也复杂化了。人、实践、价值——这些概念是 80 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向哲学所要求的。没有它们，哲学就不能适应时代，也不能推动时代。一句话，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三，哲学与群众。

在这 50 年中，前 30 年的哲学有一种现象是后 20 年没有的。这就是群众（工农兵）学哲学。1958 年 3 月在大跃进的“敢想、敢干”推动下，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组织起第一个学哲学小组，发起人是该厂车间的一位党支部书记、一位宣传委员、一位钳工，他们在生产和工作实践中以及政治运动中感到有获得理论指导的必要，而对哲学学习产生了兴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联系思想、生产、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用以指导生产，解决技术革新问题。这一活动受到厂领导的支持。《人民日报》以《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为题报导了这一活动。之后，学哲学的活动就扩展到全国的工、农、兵中去。1963 年，《哲学研究》发表社论《把哲学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哲学》给予支持，并于 1966 年出版了摘选自群众学哲学心得体会文章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

这一运动从 1958 年到 1966 年“文革”为止，其间出现过一些好文章，如李瑞环（当时是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长）和徐寅生的文章，后者被毛泽东赞誉为“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从总体上看，这一学习运动对基层的生产、工作和技术革新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学哲学运动是在一种“左”倾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是在知识分子政策未得到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必然产生一些负效应：第一，学习运动没有把专业哲学工作者同群众真正结合起来（前者被要求去“滚泥巴”，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因而运动虽

然使哲学普及工作有了一定成绩，但提高则谈不上。运动的开展忽视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而以专门工作、提高工作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第二，由于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有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正确引导，所以在中、后期便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如，出现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人们把打赢一场乒乓球直接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如果打输了，又该怎么说呢？庸俗化和简单化在“文革”期间发展为一种恶劣的方法论：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16字诀”即“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至此，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便无可挽回地逐步没落下去。

人们会问，类似60年代那种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不再出现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1. 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不适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开展。群众运动很容易使之走向简单化和庸俗化。2. 一个民族要有理论思维，但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要靠系统化和提高工作，而不是主要靠普及。3. 在新时期，经济工作是中心。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哲学思维，而是靠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他如何使用由他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应当由他自己来决定，并且要依照最有利于他个人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则来使用它们。按照这种考虑，过去那种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未必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反之，企业家和管理者却是更需要懂得一点哲学。因为合理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决策者最需要的。

第四，哲学的终极解释（对哲学真理的判断）权。

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哲学的终极解释权还给实践（至少在公认的理论认识上是如此）。而在8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解释权常常受到各级领导人的干扰。这个变化是20年来哲学发展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建国以来的 50 年，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 50 年，又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共和国发展的 50 年。前一种情况决定了：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提出的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的理论创新，大多来自党的核心领导人。这是毫不奇怪的。哲学不止是解释世界，首先要改造世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具有一切充分的条件去实现哲学理论的这一改造社会的功能。关于这一点，夺取政权时是如此，治理国家时也是如此。正是这种状况客观上也促成了 80 年代以前中国党内那种哲学终极解释权受到来自政治方面干扰的不正常状况。许多领导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往往能够提出一些有益于哲学发展的论点。但如果他把自己作为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掌权者的身份混同起来，越出国家和党的事务的范围，垄断了哲学真理的解释权，那么就会发生既不利于百家争鸣，也有损于学术民主的事情。60 年代中期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争论、“文革”后期的“儒法斗争”的争论都属于这一类学术民主贯彻不好的事例。

这种状况不是仅仅出现在中国。在以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司空见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未夺得政权之前，他们与孟什维克之间的理论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那时候并没有发生过有谁把真理的终极解释权垄断在自己的手里。到了前苏联的 30 年代，情况就变得不正常。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理论批判被渗进了权力因素。马克思主义的走向真理之路就因此而在不同程度上被堵塞了。

理论批判与政治权力都是掌权的共产党人手中的工具。但它们有各自的使用规则。理论批判不能代替政治权力。但人们也不应当为使自己在理论争论中占“上风”而滥用政治权力。“违规”的政治权力不可能在真理的“天平”上为自己增添一点砝码。领导者一旦靠政治权力获得哲学真理的终极解释权，就会使得作为学术的哲学处在尴尬的地位。如果哲学终极解释权不在实践，而在个人那

里。而个人的意见常常是一种不确定因素。那么以发展哲学学术为己任的普通哲学工作者就不得不经常注意上面的“声音”，以免动辄得咎。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之所以能够使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原因就是，哲学终极解释权从此不再垄断在某个人手里了。

第五，哲学的前景。

我认为，把握21世纪哲学的前景主要是要应付两种挑战。一种挑战是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就是说，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保持以往的地位吗？在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获得了主导哲学的地位。这使它具有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信奉者。同时，也使它得到这样的身份：其它社会科学学科都必须公开宣布要以它为指导，要与它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关系，即来自它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命运共浮沉这一事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经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这一哲学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而轻易在那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一旦那里的党和国家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统治）地位也就立即一落千丈。在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是稳固的。但是社会环境（如经济体制）和氛围也还是有点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说是“形势严峻”。因此有人担心，这一哲学的既有地位会不会改变？近来，有一篇文章直率地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三种可能的状况：第一，保持主导地位；第二，失去主导地位；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崭新的现代哲学的科学形态终于形成并得到哲学专业工作者的认同，宣布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真正诞生（黄楠森：《直面新世纪的挑战》，《北京日报》1999.5.19）。该文章的作者盼望出现第三种状况。

我认为，在进入21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第三种状况仍是难以出现的，尽管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这需要很长时间去磨合各

种思想派别，而且还需要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配合。所以更可能出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这两种状况中争取其中对我们最有利的那一种。这当然就是第一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保持的主导地位不应当像过去那样，主要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保证，而是主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以理性力量去征服人们的心灵。否则，主导地位不会是真正稳固的。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给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哪一种哲学能更透彻地回答这些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它就能主导人们的心灵，支配人们的头脑。这才是真正的主导地位。

另一种挑战来自科技革命。在 20 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教训就是：有时候，哲学不是适应新的科技革命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提出新的观念，研究新的问题，反而用抽象的、僵死的哲学教条去否定最新科技进步引发的新思想。例如，前苏联哲学界对刚刚出现的遗传因子、相对论和控制论都分别持过反对或怀疑的态度。那些以傲慢的哲学来鄙视最新科技成就的人，最终还是承认自己错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挫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未能对 20 世纪几次伟大科学发现及时做出应有的反应和在实践上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从而大大影响其综合国力，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今天从最新科技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要重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但未来的哲学也不能不思考科学文明与人类生存的关系问题。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高科技越来越进步，而道德文明却与之成尖锐的反差。在科索沃发生的北约狂轰滥炸的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最高明、最精确的技术文明与最野蛮的杀人行为融成一体。文明的创造似乎就是为了野蛮杀戮的反复出现。对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哲学智慧如果继续无能为力，人类总有一天要毁灭于自己之手。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使自己表现得比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更文明、更无愧于人类的本性。

目 录

序

王锐生

第一部分 新中国成立与主流哲学形成 (1949—1957)

〔历史背景〕	3
〔历史事件〕	6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建立	6
2. “一边倒”——中苏同盟和中美对抗	11
3. 恢复国民经济	13
4. 思想改造运动	14
5. “一化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16
6. “双百”方针	22
7. 中共八大	28
〔哲学研究概况〕	32
1. 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	32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以及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	39
3. 《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	42
4. 思想领域的批判	50
5.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初步展开	55
6.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初步运用	58

〔重要事件〕	79
1.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79
2. 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	85
3.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89
4.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	98
5. 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	106
〔观点与争论〕	115
1. 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115
2. 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	117
3. 关于中国过渡时期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 矛盾问题	125
4. 关于中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	127
〔重要文献〕	131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131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37
3. 冯定：《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 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144
4. 徐琳、肖前：《关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 过渡时期中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	145
5. 杨献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的问题》	151
6. 陶德麟：《对“矛盾的同一性”的一点意见》	158
7. 任之：《辩证唯物主义论客观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	159
8. 常学思：《真理有没有阶级性》	161
9. 蔡仪：《评〈论食利者的美学〉》	163
10. 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 同志的美学观点》	165
11. 李泽厚：《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 美学观》	169

[哲学活动]	173
1.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	173
2. 中国哲学研究会成立	173
3. 《学习》杂志创刊	174
4. 中国哲学研究会组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哲学系教师举行讨论会	174
5. 中国哲学研究会组织会员探讨改造旧大学的哲学教材问题	175
6. 艾思奇《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出版	175
7. 人民出版社成立	176
8.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哲学著作《实践论》	176
9. 李达《〈实践论〉解说》发表和出版	176
10. 《学习》杂志编印《学习译丛》	177
11.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177
12.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哲学著作《矛盾论》	178
13. 李达《〈矛盾论〉解说》发表和出版	178
14. 《毛泽东选集》(第1—4卷)编辑出版	178
15. 冯定《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发表和出版	179
16.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全部合并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79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成立	180
18. 《斯大林全集》(13卷)编译出版	180
19. 《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181
20. 《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创刊	181
21. 俞平伯出版《〈红楼梦〉研究》、发表《〈红楼梦〉简论》,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82
22.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批判胡适思想讨论会	182
23. 哲学界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	183

24. 胡风上书中共中央——《关于解放以来的艺术实践情况的报告》受到批判	183
25. 《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	184
26.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	184
27. 《哲学研究》创刊	184
28. 《人民日报》《新建设》《哲学研究》等发表批判梁漱溟的文章	185
29.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	186
30. 《列宁全集》(39 卷) 编译出版	187
31. 哲学界研究“同一性”问题	187
32. 《哲学科学研究工作 12 年(1956—1967) 远景规划》制定	187
33. 哲学界研究真理和真理阶级性等问题	188
34. 《哲学译丛》创刊	188
35.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89
36.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方针	189
37. 理论界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	189
38. 《大公报》就中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问题展开笔谈	190
39.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讨论关于中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性质问题	190
40. 美学界研究美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美问题	190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 卷) 编译出版	191
42. 北京大学哲学系举行中国哲学史问题座谈会	191
43.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192
44. 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出版	192

45. 潘梓年、金岳霖和冯友兰参加国际哲学研究所在波兰华沙召集的国际哲学会议	192
--	-----

[评论与反思]	194
---------------	-----

第二部分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与主流哲学成型 (1957—1966)

[历史背景]	199
--------------	-----

[历史事件]	201
--------------	-----

1.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201
2. “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205
3.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	211
4. 中苏论战和中苏决裂	218
5. “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和“七千人大会”	223
6. “阶级斗争为纲”——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28
7. “四个现代化”	232

[哲学研究概况]	234
----------------	-----

1. 读书、工农兵学哲学和思想领域的批判	234
2.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原著的翻译和介绍	242
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	248
4.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重新发表、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册)出版	249
5. 中外哲学的研究	253
6.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进一步运用	257

[重要事件]	276
--------------	-----